

第一章 緒論

第一節 《老殘遊記》敘事研究的動機

一、關注《老殘遊記》的藝術成就

劉鶚死後僅留下一部小說，即是《老殘遊記》¹。這部膾炙人口、廣為流傳的小說，曾被譽為是清末新小說中，最富有書寫藝術價值的一部小說。胡適先生嘗為之作序，大加讚揚說：

《老殘遊記》最擅長的是描寫的技術，無論寫人寫景，作者都不肯用套語濫調，總想鎔鑄新詞，作實地的描寫。在這一點上，這部書可算是前無古人了。²

而胡適先生此論，曾引起若干學人的關注與響應。例如，阿英先生在《晚清小說

¹ 關於劉鶚《老殘遊記》版本釐清的問題，可以追溯到最初連載於 1903 至 1904 年的小說雜誌《繡像小說》，僅刊行了十四回。其後在 1906 年時，劉鶚又於《天津日日新聞》發表，前後共有二十回。商務印書館也在 1906 年出版單行本，其書也有二十回。至於《老殘遊記二集》的九回，據考證亦連載於 1907 年的《天津日日新聞》。而後有人又發現到《老殘遊記》外編卷一，是作者生前未曾發表的。於是在六零年代，中國大陸的人民文學出版社、齊魯書社，又根據商務印書館，以及後人發現的二編、殘編再次重版，所以目前在市面或研究方面等可見之版本，均收錄了關於《老殘遊記》初編的二十回、二編的九回與外編卷一，以及關於此書的序跋、評論或考證等資料。而本論文在參考數個版本之後，決定參閱台灣著名出版社的書籍，主要有劉鶚著、田素蘭校注、繆天華校閱：《老殘遊記》（台北：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，1986 年 11 月一版，2003 年 3 月一版七刷），與《晚清小說大系·老殘遊記》（台北：廣雅出版社，1984 年一版），以及《老殘遊記》（台北：桂冠出版社，1986 年一版）以及《《老殘遊記》初二集及其研究》（台北：世界書局，75 年一版）。以及中國大陸出版的劉鶚著、嚴薇青校點：《插圖本老殘遊記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2002 年 9 月一版，2003 年 4 月二刷）等版本資料。由於受限於論文篇幅的關係，以及在論述方面的便利性，故本論文在關於《老殘遊記》內文的引用，會在論文之中標註小說之回目，不再多加標註出處、版本與頁數。

² 胡適：〈《老殘遊記》序〉，收錄於《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》（成都：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85 年一版），頁 384。

史》中，就引用胡適先生的論點，認為從文藝成就來討論或詮釋《老殘遊記》，不失為一個極佳的觀察方法：

胡適論小說，亦有所失，但對《老殘遊記》的這評語，確是極恰當的。但得說明，劉鐵雲所以然有如此的成就，主要的原因絕不在所說的「實物實景的觀察」，和「語言文字上的關係」，而是劉鐵雲頭腦科學化的結果。³

從上述二人的論述中，可見他們對於《老殘遊記》一書所蘊含的，無論是它的思想義理，還是小說語言的藝術表現，皆不吝給予高度評價。這同時也說明了這部小說，的確是具有其獨特而精湛的文藝價值，故值得加以關注與討論。筆者也認為兩人的論點，不約而同地指出《老殘遊記》之所以能在清末數千部的小說中，脫穎而出，一再地被研究、被論述與被肯定的原因所在，其於文藝美學與思想內容等方面的價值之高，自是不言即明，昭然若揭。

例如，魯迅先生曾將劉鶚的《老殘遊記》與李寶嘉的《官場現形記》、吳沃堯的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》與曾樸的《孽海花》等小說列為「清末四大譴責小說」，並指出：

光緒庚子（1900）後，譴責小說之出特盛。蓋嘉慶以來，雖屢平內亂（白蓮教、太平天國、捻、回），亦屢挫於外敵（英、法、日本），細民間昧，尚啜茗聽平逆武功，有識者則以幡然思改革，憑敵愾之氣，呼維新與愛國，而于「富強」尤致意焉。戊戌變政既不成，越二年即庚子歲而有義和團之變，群乃知政府不足與圖治，頓有掊擊之意矣。其在小說，則揭發伏藏，顯其弊病，而於時政，嚴加糾彈，或更擴充，並及風俗。雖命意在於匡世，似與諷刺小說同論，而辭氣浮露，筆無藏鋒，甚且過甚其辭，以合時人嗜好，則其度量技術之相去亦遠矣，故別謂之譴責小說。⁴

詳究魯迅先生所界定的「譴責小說論」，可從中歸納為兩個要點，加以探討。第一點，是論述譴責小說之所以產生的時代背景；第二點，是主張譴責小說有助於發揮救亡圖存的功效，改革清末弊病叢生的窘況，也就是譴責小說的社會功能。「戊戌變政既不成，越二年即庚子歲而有義和團之變，群乃知政府不足與圖治，

³ 阿英：《晚清小說史》（台北：台灣商務印書館，1968年一版），頁36。

⁴ 魯迅：《中國小說史略》，收錄於《魯迅小說史論文集》（台北：里仁書局，1999年），頁261。

頓有掙擊之意矣。其在小說，則揭發伏藏，顯其弊病，而於時政，嚴加糾彈，或更擴充，並及風俗。」所以魯迅先生認為，小說必須具有諷刺精神與譴責功效，方能發為最大的社會教育作用。故此論的重點，是從小說的內容層面上，賦予小說在政治、社會、人心等方面，所必須發揮出的教化功能與諷刺意義。

故筆者認為，魯迅先生所提出的「譴責小說論」，是從文學反映社會、改革時局的觀點上，加以界定與論述的。此一觀點的本身，並沒有絕對的是非對錯之別，而僅是針對不同的小說文類，採用不同的論述方法而已。但魯迅先生此論一出，便引發學術界的廣泛支持，更幾乎成為人們理解清末四大小說唯一的著力點。歸納其箇中緣故，乃因魯迅先生是較早針對清末小說進行學術性分類研究的人，所以魯迅的「譴責小說論」，才會一再地被後代學人所沿用⁵。

雖說魯迅先生的論點，確實加強了清末小說在社會批判與人心教化上的意義與功能，進而凸顯出小說的諷刺功用與價值，但在詮釋小說敘事美感，與書寫風格等藝術層面上的探討，卻略顯不足，而有輕忽偏廢之處。所以筆者認為探討《老殘遊記》所負載的諷刺作用與譴責功能，僅是討論小說文本時所能採取的眾多方法之一，並無法完全涵蓋《老殘遊記》在敘事書寫上所臻至之藝術成就，及其於小說史發展上的意義。因此，本論文期望採用敘事學的研究方法，針對《老殘遊記》的書寫藝術與文學成就，進行更廣闊的探討。

二、討論《老殘遊記》敘事研究的可行性

魯迅先生「譴責小說論」的正確性，近年來曾經引起學術界的爭論，有部分學者對「譴責小說論」，表示否定的態度，並不認同清末小說是以譴責為主要內容與目的，並認為魯迅先生的論述，受制於詮釋角度的侷限與牽絆，從而陷入偏頗之境，故主張魯迅先生「譴責小說論」的定義正確與否，是需要重新加以審視的⁶。但是，從文學藝術研究評論的角度看來，魯迅此論，並無絕對意義上的

⁵ 引用陳平原先生的看法，認為魯迅先生雖然標榜「清末譴責小說論」，但是這樣的歸類與界定，在概念上或論述上，確實有需要再詳加釐清與補充的部份。然而，魯迅在小說史研究上的貢獻，是可以被肯定與接受的。因為魯迅先生的小說研究，「終於使得小說史的研究擺脫了作家作品點評的傳統方式，走向綜合性的整體把握。」《小說史：理論與實踐》（台北：淑馨出版社，1998年一版，）頁233。

⁶ 魯迅先生在清末小說中，另闢蹊徑，標榜「譴責小說論」為清末小說的代表象徵，一時之間，

對錯問題，因為這只是一種詮釋批評角度上的歧異，而批評視角的歧異，勢必導致研究結果，產生差異的現象。

雖然魯迅先生的「譴責小說論」影響甚遠，但終究無法全然掩蓋《老殘遊記》在文藝書寫上散發的藝術魅力與鋒芒。關於這一點，我們可以從胡適先生的「無論寫人寫景，作者都不肯用套語濫調，總想鎔鑄新詞，作實地的描寫」一說得知，《老殘遊記》作為一部新小說而言，不只於內容及功能上，有其不朽之貢獻，更在藝術書寫層面上，取得了無可磨滅的巨大成就。因此，胡適先生的論點，與魯迅「譴責小說論」依題材的歸類論述，可以說是同時論及《老殘遊記》在書寫藝術與諷刺譴責上的意義。而這樣的討論，也引發了筆者想要重新採用敘事學的操作方法，再一次重新觀察、討論與研究《老殘遊記》的動機。

胡適先生、魯迅先生與阿英先生等前輩學人的論述，一而再、再而三地肯定《老殘遊記》是一部具有時代意義、文學藝術與思想內涵的小說，故值得吾人再次對《老殘遊記》加以探究與定位。筆者在閱讀前輩學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，開啓了對於《老殘遊記》重新研究的契機與興趣，故期望能運用敘事學的研究思路與詮釋方向，為《老殘遊記》的研究視野，開拓一片全新的景貌。因為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發展，在清末曾經發生過劃時代的重大轉變⁷。根據陳平原先生的研究，清末新小說家們在小說理論與敘事模式上，產生了小說革命論，以及在小說的敘事時間、敘事角度與敘事結構等方面，有過重大的突破。這對中國小說敘事的發展，產生十分深遠的影響。而在這個小說敘事模式轉變的時刻，《老殘遊記》著實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：

《老殘遊記》第十五回至二十回敘老殘破齊東村十三人命案，都借用倒裝

使「譴責小說」一詞經常學術界加以被採用。可是，夏志清先生曾對魯迅先生提出的譴責小說，有所質疑，並且不以為意，認為魯迅先生是因為名重一時，加上中國小說的研究途徑，大都循他所關的體系發展，才會導致「譴責小說」一詞成為清末小說的通用語。因此，夏志清先生認為：「魯迅如果能多關注李寶嘉的《文明小史》，而不是《官場現形記》，又注意吳沃堯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》以外的重要作品，特別是那部叫人惊心动魄，一輩子忘不了的《九命奇冤》，那時，魯迅就要再界定或放棄『譴責小說』一詞了。」《文學的前途》（北京：生活、讀書、新知三聯書店，2002年一版），頁59。

⁷ 陳平原先生指出：「（新小說家）承認並借鑑西方小說某些敘事技巧（如倒裝敘述、第一人稱限制敘事等），就不能不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應，在重新選擇、重新解釋、重新確認傳統的過程中，自覺或不自覺地轉化了傳統。而正是這『轉化了的傳統』，對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。」《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3年初版），頁140。

敘述技巧，不斷製造懸念，不斷推進情節，把現在的故事和過去的故事糾合在一起，借助「發現」的程式，逐步展現早已過去的故事的全貌，其佈局之嚴謹非傳統連貫敘述的小說可比。⁸

陳平原先生曾以敘事學的研究方法，從中歸納比較之後，認為劉鶚的《老殘遊記》確實在中國小說敘事史的發展上，開創了不同以往傳統章回小說的連貫敘事模式，而發展出具備自我特色的書寫風格。可謂是清末小說敘事史的湍湍洪流裡，所激盪出的一朵美麗水花，奪人眼目而無可磨滅，是以筆者認為，《老殘遊記》一書的書寫藝術，確有值得再次加以重新審視的必要，而且需要採用新的研究視角與分析方法，為《老殘遊記》的研究，開拓嶄新之契機。雖然這部小說從最初連載於1903年的《繡像小說》至今（2006），已有長達百餘年的歷史，但其中仍有許多值得討論與精研之處。

是以本論文期望能借用中西方敘事理論的研究方法與批評角度，來分析《老殘遊記》的敘事模式與手法。採取另一個新的視角，重新審視這部被譽為清末小說史中，最富有書寫藝術價值的小說。另外在《老殘遊記》一書中，時常在每回敘述終了之後，附上「原評」。而這個「原評」，也是一個相當值得關注的研究課題。若從「原評」作為小說寫作與評論的角度來看，「原評」的重要性，自是昭然若揭。因為「原評」的寫作，一方面是小說宣傳與傳播的手法或技巧，一方面又在小說敘事的結構裡面，扮演一種不可或缺的角色，它們可以說明小說文本的意義或象徵，也可作為小說文本批判對象的揭示。

因此，「原評」是一種對小說文本的加工、組織和結構化的寫作模式，就像在小說文本的敘事者與閱讀者之間，搭起一座可以提供雙方溝通與對話的橋樑，使得敘事者與閱讀者之間，能夠發生更加密切的互動與聯繫。這種以小說家的寫作意涵，作為批評園地的小說原評，是在小說敘事的故事情節之外，又增加了一個發表評論的敘事者，可以直接或更深刻地說明小說故事情節的意義、目標或核心價值，以便於讓閱讀者，更容易體察到小說所要傳達的重要訊息與核心價值。由於「原評」本身的設計，一方面是讓小說敘事的意義，可以得到較為完整的詮釋方向與理解方式，一方面也是讓閱讀者在閱讀過程中，不僅是侷限於單純觀賞故事情節的發展，而能夠停下緊湊的閱讀步伐，來思考小說所要傳達的評論觀

⁸ 陳平原：《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3年初版）頁47。

點、文藝趣味或補充見解等。

因此，倘若細究《老殘遊記》「原評」的書寫意義，可以從中得知劉鶚對於《老殘遊記》的詮釋方向與觀點，究竟為何。因為劉鶚透過原評，對故事情節的發展，或是人物之間的互動，小說敘事結構等各個層面，皆有所觸及與討論，且從中發表個人對於小說文本的看法，或為小說文本進行資料補充的工作。是以筆者認為，《老殘遊記》的原評在全書中所扮演的功能，就是劉鶚本人對這部小說加入的特定詮釋，或是書寫過程的寫作推想；又或者劉鶚也期望透過原評，能為《老殘遊記》提供某些方面的解讀，或作為補充資料之用等。這些問題，都是值得繼續深究的。

小說敘事的研究，雖然是針對小說文本本身而發，然而筆者認為，小說是藉由小說家的雙手寫作，才能從原本只是腦海中的抽象構思，得到形象化、具體化的機會，進而被書寫創作出來，然後出版問世，才廣為人所閱讀。因此，小說家與小說之間，確實具有一定程度的關聯性，討論小說文本時，亦不能將之與小說家直接加以分割討論。故筆者以為，在論文當中必須討論小說家劉鶚是如何安排、設計與寫作《老殘遊記》的經過，亦必須嘗試搜尋出當時的出版背景，以及流傳情況等等相關的時代資料，方能建構較為完整的論述。筆者相信，要討論小說藝術，或是敘事書寫在文學發展脈絡上的貢獻或意義，必須從小說家與小說本身的關係上著手，於是小說產生的時代背景、歷史意義或小說敘事風格，方能得到較為脈絡化與全面化的研究論點。

至於論文寫作方面，筆者希望能在精研小說敘事研究的討論，與建構小說文本的文藝價值上，觸及清末的社會背景及文化深層等議題，來確立《老殘遊記》在清末小說史上的價值與意義。也企盼能藉由劉鶚《老殘遊記》的敘事研究，針對小說敘事美學的理論，與小說研究方法的運用，以及切入角度的面向等文藝理論研究架構，進行解讀、詮釋與建構，期望能從此深入鑽研的過程中，獲得新知而有所進展。

第二節 前人研究的相關成果

筆者所要討論的，是清末小說中極具文藝書寫藝術價值的《老殘遊記》，首要關心的問題是：為何這本小說，被譽為是清末文學界中，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？前人對於《老殘遊記》的評析或論述，是否合理？而《老殘遊記》書寫藝術的獨創性，到底是什麼？能不能仔細地說明清楚？這層出不窮的問題，引發了筆者採用敘事學方法研究《老殘遊記》的動機，因為「敘事學」是一個關注於文本本身的研究學問，主要的關注焦點，在於研究文本敘述的存在型態或組成的架構。因此，筆者相信，從這個角度來操作與詮釋《老殘遊記》，必定可以重新啓示後人《老殘遊記》這部小說的跨時代象徵意義，並證明《老殘遊記》在成書百年以後，依然能夠滋長嶄新的生命。據此，筆者期望能在文藝研究的領域有所發展，在敘事理論的討論中，作出一番貢獻。

關於劉鶚《老殘遊記》相關的研究成果，從它成書出版或者更早之前（指的是刊登在《繡像小說》期間），已經有人開始針對《老殘遊記》的版本校定、故事來歷以及反映的時代背景等議題，進行考察、解析與研究。從胡適先生〈《老殘遊記》序〉、魯迅先生〈清末譴責小說與《老殘遊記》〉與阿英先生《晚清小說史》等論述裡，或是外國學者（加）哈羅德·謝迪克先生〈《老殘遊記》英譯本前言〉與（日）樽本照雄先生〈《老殘遊記》新論〉等人的研究⁹，都觸及到《老殘遊記》在清末小說藝術書寫上所作出的貢獻。而除了上述諸位的研究之外，這數十年來，兩岸三地的前輩學人關於劉鶚《老殘遊記》的期刊、論文與專著，更是多采多姿，粲然有其可觀之處。其中足資以參考的資料，更是取之不竭，十分豐富多樣化。因此，筆者將相關的研究成果，列舉其犖犖要者，將之概括為以下幾個面向：

一、劉鶚生平與思想研究的探討

《老殘遊記》的原創者到底是何人？小說中又蘊含了那些義理思想？首先回應這個問題的是胡適先生，他在〈《老殘遊記》序〉一文中，從史實的角度切

⁹ 以上所引用的期刊、序文或論文，均收錄於《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》（成都：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85年一版）。

入，詳細地針對劉鶚生平事蹟作考察，因此對於劉鶚在學術思想方面的貢獻，有簡要而據實的論證。自胡適先生此論以降，針對劉鶚思想義理的考察、以及交友狀況或生平事蹟等針對史實層面所進行的研究，隨之蓬勃發展起來。加上劉鶚後代族人，如劉德隆等人，從塵封的書櫃、床底中，尋覓出劉鶚生平留下的一筆一畫，更豐富了劉鶚生平與思想方面的研究史料，也讓後人得以更加深入地認識劉鶚這一號人物。

雖然劉鶚的思想，在中國大陸五、六零代的文革期間，曾受到強烈的懷疑與指責，但這也只是一種偏頗的論點，故並無法掩蓋《老殘遊記》本身散發的奪目光芒¹⁰。因為，要討論到劉鶚的思想義理，首先要關注劉鶚生平的實學思想，即是太谷學派義理的表現。關於這一點，劉蕙孫先生〈太谷學派政治思想探略〉、〈太谷學派的遺書〉，以及嚴薇青先生〈劉鶚和太谷學派〉等篇章，皆從清末儒學思想的發展談起，再討論到劉鶚與太谷學派的實學思想，進而描繪出劉鶚先生思想體系上的承先啓後。關於這個部分的討論，實有助於我們瞭解劉鶚思想的根基所在，與他看待人生的態度，也提供我們瞭解清末文人在面對時代變局的挑戰之時，所選擇的生命情懷。筆者也於《老殘遊記》一書中，對於劉鶚的思想，亦有所窺知之處。因此，筆者也將在論文當中，針對劉鶚《老殘遊記》的思想脈絡，以及他與太谷學派之間的關係，進行探究與討論。

二、《老殘遊記》版本的釐清

《老殘遊記》最初連載於 1903 至 1904 年的小說雜誌《繡像小說》，至十四回中斷。其後於 1906 年，又重新發表於《天津日日新聞》，前後共計有二十回。在 1906 年，商務印書館曾出版單行本的《老殘遊記》，而《老殘遊記》的二編則是於 1907 年連載於《天津日日新聞》，現存九回。另外劉鶚後人又發現《老殘遊

¹⁰ 根據劉瑜先生的看法，中國大陸關於《老殘遊記》的研究，因為受到文革時期的影響，在五、六十年代，對於《老殘遊記》思想內容的解讀，是從馬列主義強調現實革命論的批評角度立論，因此否定了《老殘遊記》在思想義理以及文學造詣等方面的成就。但是自從文革結束至 1986 年，學術界的人士認為《老殘遊記》瑕瑜互見，尚值得推崇。直至 1987 年之後，學術研究的思考路線逐漸開展，文藝理論也蓬勃發展，問題討論的層次也較為多元。故最終對於《老殘遊記》的評價，均一致推舉其為民族的珍寶，在文學造詣與思想義理的評論上，也較為公允客觀。〈四十五年來劉鶚及《老殘遊記》研究述評〉，《文學遺產》，1998 年 2 期。

記》外編卷一，是劉鶚生前未曾發表的。六零年代，中國人民文學出版社、齊魯書社，又根據商務印書館單行本，以及後人發現的二編、殘編等，再次校定出版，所以目前市面上流通或研究等版本，均可見其收錄關於《老殘遊記》初編的二十回、二編的九回與外編殘卷一回，以及錄於相關的序文、註釋與評論、修訂校正等資料，十分完備齊全。

關於《老殘遊記》版本考訂的問題並不大，因為初編二十回的版本，確定為劉鶚本人所作，亦嘗刊登於報刊雜誌之上，並有成冊出版為證，故可以確定原創者即是劉鶚本人。但是二編與殘編，是否為劉鶚本人所著，就曾經引起懷疑與討論。劉鶚後人劉厚醇先生，即於〈《老殘遊記·二編》存疑〉一文中，引用郭箴一先生在《中國小說史》中對於二編寫作的時間點、小說人物語氣與地區方言等方面立論，質疑二編並非劉鶚本人所作，而為後人所杜撰。但此論立即遭到馬幼垣先生的反駁，且日人樽本照雄，又提出連載於1907年《天津日日新聞》的影印本，證實二編的作者確為劉鶚本人，從此定論。至於殘編是否為劉鶚所作，馬幼垣先生認為，由於殘編殘缺不全，篇幅又過於簡短，復加以尚未出版刊刻，所以殘編是否為劉鶚本人親筆所寫，並無大礙¹¹。初編與二編的藝術價值，已足以讓《老殘遊記》，臻至不朽之藝術高峰。

三、關於《老殘遊記》文學藝術的評論

關於《老殘遊記》在文學藝術上的研究，相關資料不僅豐富精彩，而且十分繁複。筆者在參考書目中，詳列了從胡適先生到魯迅先生、馬幼垣先生、陳平原先生、季桂起先生、林瑞明先生、李瑞騰先生諸位前輩學人的理論，這些針對《老殘遊記》的研究，在這四、五十年以來，如接力似的一而再地肯定了《老殘

¹¹ 胡適：〈《老殘遊記》序〉、魯迅：〈清末譴責小說與《老殘遊記》〉、馬幼垣：〈讀劉著《老殘遊記·二編》存疑〉等文章，均收錄於《劉鶚及老殘遊記資料》（成都：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85年一版）。陳平原：《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3年一版）。季桂起：《中國小說體式的現代轉型與流變》（濟南：山東大學出版社，2003年一版）。林瑞明：《晚清譴責小說的歷史意義》（台北：國立台灣大學出版委員會，1980年一版）。李瑞騰：《《老殘遊記》的意象研究》（台北：漢光文化出版社，1992年一版）。

遊記》在文學藝術層面上作出的成就與貢獻，並且加以重新討論與定位，讓後世讀者可以對於百年前的《老殘遊記》一書，有更為全面而深刻的認識，不致受時空的隔閡而有所窒礙。

而關於《老殘遊記》文學藝術的研究論述，更是不勝枚舉。從小說在寫景狀物的美感表現、意象書寫的藝術呈獻，以及探討傳統與現代性的衝突與融合，或者針對小說人物本身的象徵意義以及其所負載的諷刺、譴責功能等研究面向，均有所觸及與涵蓋。因此，筆者在此列舉李瑞騰先生《《老殘遊記》意象研究》¹²，供為入門研究的參考之用。例如李瑞騰先生採取論詩意象學的討論方式，作為理論切入點，結合了小說在書寫人物與景物上，所彰顯的特色與筆調，將劉鶚的悲、傷、哭、泣與山水景物，賦予彼此之間聯繫的關係，使得情景之間互相依存、相輔相成，情寓於景，景能顯情。筆者認為，如同李瑞騰先生這般的討論，開展了《老殘遊記》藝術研究的視角，而使這百年前的清末小說，滋長出新的時代生命，新的文化意義，也啓迪了本論文的寫作動機。故筆者欲以敘事藝術理論作為理論立足點，而對《老殘遊記》的敘事模式，重新加以審視和定位，並詳究《老殘遊記》在清末小說敘事史上，取得的書寫成就與意義。

四、相關研究的學位論文

從上述相關的討論可知，當前的研究中，已有學者注意到了《老殘遊記》在清末小說敘事史上的意義與價值，也針對《老殘遊記》的意象書寫，做出了全盤性的研究。這是《老殘遊記》研究的進一步開展，也為《老殘遊記》的研究，標誌了一座嶄新的里程豐碑。至於學位論文方面，台灣地區目前有五本專門討論劉鶚《老殘遊記》的碩士論文，即淡島成高先生的《劉鶚研究》¹³與王瑞雪先生的《劉鶚及其老殘遊記研究》¹⁴，此皆著重於劉鶚生平經歷方面的探討，並且根據《老殘遊記》一書中的記載加以佐證，其中對於劉鶚生平事蹟的考察，甚為詳全。而李基承先生的《老殘遊記研究》¹⁵與方哲桓先生的《老殘遊記析論》¹⁶，

¹² 李瑞騰：《《老殘遊記》的意象研究》（台北：漢光文化出版社，1992年一版）。

¹³ 淡島成高：《劉鶚研究》（台北，私立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85年）。

¹⁴ 王瑞雪：《劉鶚及其老殘遊記研究》（台北：私立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，1985年）。

¹⁵ 李基承：《老殘遊記研究》（台中：私立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1986年）。

則是從小說藝術成就方面著手，對於小說中的細部書寫，有相當精闢獨到的看法。至於陳姿祜先生的《《老殘遊記》女性人物的社會角色研究》¹⁷，則是以小說中的女性人物，作為探討的主要對象，並又結合社會環境與時代思潮等背景因素，加以綜合討論，進而彰顯小說中的女性人物所負載的象徵意義與時代意涵，並主張小說中的女性角色，確實也能夠發光發熱，產生有別於過去只著重書寫男性角色，以男性角色思維為中心的人物論述。

以上五本關於劉鶚《老殘遊記》相關研究的學位論文，筆者均列入本論文的參考書目之中，且加以借鏡、引用，以作為參考學習之資。盼望能在前輩學人的研究基礎之下，能有更進一步的拓展。至於其他相關的學位論文，筆者也加以收集與參閱，期望能從這一系列的學術資源，以及旁徵博引的累積之中，取得另一番的研究成果。雖然《老殘遊記》已有許多前輩學人，從各種不同的面向上，加以研究與討論，而所取得的收穫和成果，確實也相當豐碩。但這並不表示前人的研究，已成功解決一切文本上的問題。因為，當我們重新採用不同的研究視角或討論方式切入文本時，往往會從中開展出不同的詮釋空間¹⁸。而且，在前人相關性的研究中，筆者並未見到有學者採用敘事學的研究方法，全盤探討《老殘遊記》的文學藝術價值，說明《老殘遊記》在清末小說敘事史的意義。

筆者認為，《老殘遊記》的敘事研究，是一個舉足輕重的議題，實不可輕忽。因此，筆者選擇這個題目與範圍，作為學位論文，希望能從敘事研究的角度，一方面提出具體的研究架構，進行系統化、脈絡化之學術考察，一方面也期盼能在前輩學人研究的基礎上，進一步地針對前人研究中尚未觸及或疏漏之處，加以強化與補充。筆者希望，能透過這個重新看待《老殘遊記》的敘事意義與價值的過程，辨明其間的結構、視焦、人物與時空等書寫上的因果關係，並尋求詮釋的適當角度，重新理解與探討《老殘遊記》，而賦予《老殘遊記》在文藝書寫成就層面，所標立的一個新定位。筆者相信，在結合目前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，採用敘

¹⁶ 方哲桓：《老殘遊記析論》（台北：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，1987年）。

¹⁷ 陳姿祜：《《老殘遊記》女性人物的社會角色研究》（台北：台北市立師範學院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，2004年）。

¹⁸ 如同劉瑜先生所言：「研究方法的革新是十分重要的，並非附庸時尚。用文藝學的多種方法來研究劉鶚及《老殘遊記》，只是剛剛開始。有些方面運用了新方法進行研究，論文更只是一兩篇或兩三篇，有些方法尚未得到運用。文藝學方法十多種，對劉鶚及《老殘遊記》的研究，大多可被派上用場。」〈四十五年來劉鶚及《老殘遊記》研究述評〉，《文學遺產》，1998年2期。

事學的研究方法，適當地擴展研究範圍與詮釋空間，必定有助於劉鶚《老殘遊記》的研究發展。

第三節 敘事學理論的研究架構

敘事理論，是一套研究小說敘事的體系架構。在實際操作上，本論文不欲事先預設任何西方現成的敘事理論，或是將中國傳統小說評點學的角度，套用在《老殘遊記》上，作為本篇論文的研究方法。而是藉由實際閱讀小說的人物，且從敘事立場、時間、空間等諸多視角，重新看待《老殘遊記》，從而進行多層次的討論與分析，並在此一論析的過程之中，從而逐漸形成一套詮解的模式與討論的架構，加以重新標誌《老殘遊記》在文學史上的定位，進一步塑造一個以傳統文學理論作為根基，結合西方小說敘事理論的研究方法，以賦予《老殘遊記》文學、歷史與學術上的價值。

小說敘事研究，不僅是對於小說文本的重新理解，更是一種思索的過程，是一種重新觀察小說的研究角度。本論文的主要目的，即在釐清《老殘遊記》於小說敘事模式上的重要性，而這也是一種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。筆者相信，如此一來，必定可讓《老殘遊記》能夠憑依著它自身的文學能量，再度為世人所見，繼續在未來的文壇上發光發熱。這也是筆者對劉鶚《老殘遊記》研究的一種學術責任。因此，本論文將在前賢們的探究、評論與精研的基礎之上，融會傳統、現代與當代的小說敘事理論，望能對《老殘遊記》以及清末小說敘事的研究工作，盡一己之心力。

一、敘事學研究原則的掌握

近代中西方敘事理論的研究，各式各樣的論述，宛如雨後春筍，迅速且蓬勃地發展，並且又推陳出新，因此若要一一探究各派各家的說法，實為研究之難題。因此，本論文僅能從俄國形式主義學派、英美新批評、結構主義與解構主義等方向，著手探究《老殘遊記》繼承與創新敘事理論的部分，進而結合中國傳統以史傳為主的歷史敘事論，以及小說評點學，作為此篇論文之研究方法。亦即攝

取中西方敘事理論的精義，針對《老殘遊記》小說敘事的需要，提出一套敘事研究的方法。

關於中國傳統之敘事理論，主要可從史書傳記的體系，以及小說評點學來談起。中國傳統敘事文學理論的發展，首先須先注意到歷史敘事，一般論述大致上認為，中國的敘事文學，在先秦階段已漸漸地發展起來，有的學者追溯到甲骨文與青銅銘文，以之為中國敘事文學的開端，也有學者認為《尚書》是中國敘事文學的奠基與濫觴，而《左傳》則是中國敘事文學發展的一座豐碑¹⁹。但是，敘事文學的發展，並不意味著敘事理論也隨之繁榮起來，事實上，中國傳統敘事理論，直到唐代才開始出現討論。引用楊義先生的研究：

真正名詞化了的「敘事」這個詞的出現，是在唐代劉知幾的《史通》裡面，《史通》是中國古代歷史學的一部重要著作，它專門設了一章叫《敘事》，它說『國史之美者，以敘事為工』。²⁰

從唐代的劉知幾的《史通》，到南宋真德秀的《文章正宗》，其中將文章分為四類，裡頭確實有一類，就以「敘事」為名，「敘事」的內容，主要包括一些歷史的敘事、散文的敘事，例如墓誌銘，即屬於這一類的敘事文體。

從《史通》或《文章正宗》等歷史敘事的定義與分類上，筆者認為中國傳統的歷史敘事，只著重於史學家的筆墨行文，以之作為寫史的輔助工具與文章的分類標準。這樣的敘事界定和本論文所謂的敘事研究，在定義方面有著極大的差異性。但是這種差異性，並無礙於本論文的研究，因筆者認為以史為起點的歷史敘事，是中國傳統敘事理論的基礎。倘若從歷史敘事的角度來討論《老殘遊記》，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知道，傳統歷史敘事的敘事時間，是具備時空上的連貫性的，是具備順序上的開端、過程與結束的，如同日昇月落、春去秋來般，含有時空上的順序關係。而這種敘事模式，也影響到了傳統章回小說的敘事手法，明清小說的敘事手法，和傳統的歷史敘事一樣，也是如此按照順序加以寫作，故同樣具備了時空上的連貫性。但是，這種傳統歷史敘事的連貫性，卻在《老殘遊記》一書

¹⁹ 關於先秦敘事文學的發展或敘事研究，請參閱傅延修：《先秦敘事研究：關於中國敘事傳統的形成》（北京：東方出版社，1999年一版）；王靖宇：《中國早期敘事文研究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3年一版）等論及關於中國上古時期敘事模式發展的專書。

²⁰ 楊義：《重繪中國文學地圖：楊義學術講演集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3年一版），頁3。

中，受到了質疑、挑戰與突破²¹。

中國敘事理論的發展，除了歷史敘事的方法之外，我們可以也看到明清小說評點家們，針對傳統的章回小說，所應該囊括的寫作目標、技巧、風格、態度與題材選擇等問題，紛紛提出更專門、精確的論述²²。例如李贄、葉晝、馮夢龍等人，就為傳統章回小說美學理論奠定了基礎。而明清小說繁盛的創作風氣，以及受古文選點的影響等，帶動了小說評點學的迅速繁興。從金聖嘆評點《水滸傳》、毛宗崗評點《三國演義》、張竹坡評點《金瓶梅》、脂硯齋評點《紅樓夢》，可知小說評點學在當時如何風行，而他們也都為傳統章回小說的美學研究，開創了一番嶄新的風貌，且進一步地建立了中國小說評點學的體系²³，這也有助於筆者對於傳統章回小說發展體系的瞭解。

筆者認為，中國評點小說的寫作模式，影響劉鶚在《老殘遊記》原評方面的寫作。如果能進一步針對《老殘遊記》的原評，加以深入挖掘探勘，必定有助於開拓《老殘遊記》敘事模式研究的領域園地。原評雖可以歸納為評點的一種，但原評不僅是對於故事題材的討論，也觸碰到了社會、文化、政治、教育、敘事書寫等方面的議題。因此筆者認為，在討論《老殘遊記》敘事理論的同時，絕對需要針對原評部分進行探究的工作。至於所謂的中國傳統敘事理論，是由歷史敘事與小說評點二者架構而成，故其本身並無法明確地進一步說明何謂「敘事理論」，現今可見的中國傳統敘事理論，往往是後輩學人針對傳統文集、評點或小說、戲曲等文獻資料，加以歸納分析而成，作為一種理論架構式的展現。因此，本論文在採用敘事學理論的方面，不僅在中國傳統的敘事理論上有所繼承，同時需要借鏡於西方發展的敘事學理論。

至於西方發展的敘事理論方面，主要以敘事學發展相關性的研究為主，即

²¹ 陳平原：《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3年初版）頁140。

²² 關於小說評點的體例以及形式表現的意涵等方面，可參見葉朗先生指出：「開頭有個《序》。序之後有《讀法》，帶點總綱性質，有那麼幾條，十幾條，甚至一百多條。然後在每一回的回前或回後有總評，就整個這一回抓出幾個問題來加以議論。在每一回當中，又有眉批、夾批或旁批，對小說的具體描寫進行分析和評論。此外，評點者還在一些他認為最重要或最精彩的句子旁邊加上圈點，以便引起閱讀者的注意。」《中國小說美學》（台北：里仁書局，1987年一版），頁15。

²³ 關於明清小說評點學的討論與研究，相當豐富，不甚枚舉。請參考章培恒、王靖宇主編：《中國文學評點研究論集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一版）；或林崗：《明清之際小說評點學之研究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9年一版）；或孫琴安：《中國評點文學史》（上海：上海社會科學院，1999年一版）等，皆有相關的專門論述。

俄國形式主義、英美新批評派、法國結構主義與解構主義思潮等四大文藝批評思潮，作為本論文理論開展之著力點，並且從中去蕪存菁，使之更適於作為探討文本的研究方法。由於其間流派眾多，內容龐雜，無法一一談起，筆者僅能提及與本論文相關的理論加以探討。例如文論家福斯特在探討小說理論的專書《小說面面觀》中，對於小說的看法，提出了說明：

小說的基礎是故事，而故事是對一些按照時間順序排列的事件所進行的敘述。²⁴

福斯特簡單道出了小說文本的特質，是以「故事」作為敘述的基礎，然後按照「時間」的前後「順序」，來加以安排組織而成的，是一種敘事的形式。福斯特並認為，小說文本要有「開場白」、「故事」、「人物」、「情節」、「幻想」、「預言」、「模式」和「節奏」等七種項目，方能組成小說的敘事結構。筆者認為若是這樣橫式移植福斯特的小說理論，基本上並不適合直接套用在中國小說文本的身上，當中必須有所補充、更新與轉化，於是筆者也參考了普羅普所提出之「敘事功能論」的定義，指出文本中同一角色可能在人物、名稱或地點上有所變化或更動，但是仍可從人物敘事的結構設計上，得知人物本身的功能以及所蘊含的意義²⁵。且筆者也以巴赫金所提出的「對話理論」、「嘉年華式的狂歡理論」²⁶、熱奈特討論「虛構小說敘事可從：時序、速度、頻率、語式與語態等問題來討論」²⁷，以及米克·巴爾針對「本文、故事、素材」三角度提出的敘事分析等相關敘事理論的專書及著作²⁸，以作為本論文的參考之資。相信這對於筆者在進行劉鶚《老殘遊記》的敘事研究，必可提供極大的助益！

但筆者有一大堅持，即是主張西方發展的敘事理論，不一定可以完全套用在中國小說之上，而必須在攝取中西兩方的敘事理論的論述與批評的同時，有所

²⁴ E. M. Forster：《小說面面觀》（北京：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，2001年一版），頁81。

²⁵ 羅綱：《敘事學導論》（雲南：雲南人民出版社，1994年一版），頁26。

²⁶ Bakhtin M. M.：《小說理論》、《文本、對話與人文》、《哲學美學》（河北：河北教育出版社，1998年一版）。

²⁷ Genette：《敘事話語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90年一版）。

²⁸ Mieke Bal 著 譚君強譯：《敘述學：敘事理論導論（第二版）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3年二版）。

取捨、補充或改進，使之能夠適合中國小說敘事藝術論述的呈現，而不至落入格格不入的荒窘之境。至於西方的敘事學說，從八零年代開始引進，並用於研究中國小說以來，成果已經十分豐碩。舉例來說，有浦安迪先生的《中國敘事學》²⁹、楊義先生《中國敘事學》³⁰、羅綱先生《敘事學導論》³¹、陳平原先生《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》³²等諸多採用敘事學方法討論中國小說之作。這對於筆者在瞭解西方敘事理論運用於中國小說的研究以及論述上，亦不啻為極佳的出發點，且給予筆者在思考時，極為有力的幫助。因此，本論文在寫作理論上，不僅將觸及到中國傳統的歷史敘事、章回結構與小說評點等敘事理論，也將一併參考前輩學人的相關論述，進而在既有的研究成果上，提出更縝密且細膩的研究架構，使《老殘遊記》的敘事藝術，歷經百年之後，猶能詳盡而完整地呈現在世人面前。

二、本論文的研究架構

筆者將採用觀察劉鶚生平遭遇的方式，著手展開本論文的研究架構，因為一部敘事文本，必定是經過小說家的精心巧思與苦心經營，才能完成問世的。所以對於小說家本身的相關研究，乃是勢在必行。故筆者將會談到《老殘遊記》與時代環境，從中論述這部小說與民間文化的種種關聯，這不僅是考察劉鶚的生平舉止，而是採取放大觀察的角度，從時代背景、社會取材與思想風氣等方面，加以論述，期望能藉此由從點到線，乃至於兼顧全盤的方式，來對《老殘遊記》的敘事研究，作出更為透徹的分析。至於在小說敘事研究的方面，筆者在此首先要引用陳平原先生的論點：

對於（清末）新小說來說，最艱難、最關鍵的變革不是主題意識，也不是情節類型或者小說題材，而是敘事方式。前三者主要解決『講什麼』，而後者則必須解決『怎麼講』。³³

因為上述的論點，開啓本論文在研究命題上的出發點。筆者將要從小說家劉鶚作

²⁹ Andrew H. Plaks：《中國敘事學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5年一版）。

³⁰ 楊義：《中國敘事學》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97年一版）。

³¹ 羅綱：《敘事學導論》（雲南：雲南人民出版社，1994年一版）。

³² 陳平原：《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3年一版）。

³³ 陳平原：《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·第一卷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7年），頁15。

為新小說家的代表人物談起，之後再將其聯繫到《老殘遊記》「講什麼」與「怎麼講」的敘事問題，進而從敘事學的研究架構，著手討論這部小說在敘事藝術上的問題。

筆者提出了小說敘事人物類型的研究、敘事視角的運用、敘事時空的佈局、敘事結構的設計，這四個不同層次的研究面向，希望能從以上這四個不同面向的論述中，淬取《老殘遊記》敘事模式的藝術價值與歷史意義。本論文首先要論述小說人物的類型研究，因為人物是小說敘事的中心，故事情節是有人說的，小說事件也是由於人物而產生的，所以論述的重點，將放在討論《老殘遊記》人物類型的特色之上，以及論述小說人物的代表涵義。至於敘事視角方面，筆者認為，首先要理解小說敘事的說話者，究竟是全知敘事者？還是限知敘事者？小說敘事者是在外部觀看小說情節的發展？還是進入人物內心的訴說？這些關於敘事視角的問題，都值得加以深入探討。至於敘事時空方面，即在討論小說敘事的時間與空間，討論時間的連貫與倒裝、書寫空間的自然想像，且對於敘事時空的藝術，也會有所觸及。在敘事結構方面，則是討論劉鶚如何用舊章回寫新小說，以及如何安排小說敘事結構的設計並加以書寫，還有初編與二編之間的銜接關係等結構問題。

筆者期盼能藉由敘事學的研究方法，重新審視這部能在清末數千部的小說之中，脫穎而出且被賦予極佳讚譽的《老殘遊記》，並能從中發現這部小說在敘事藝術上的奧妙之處，以及在小說敘事史上取得的書寫成就。

